

《散文选刊》精品丛书·生活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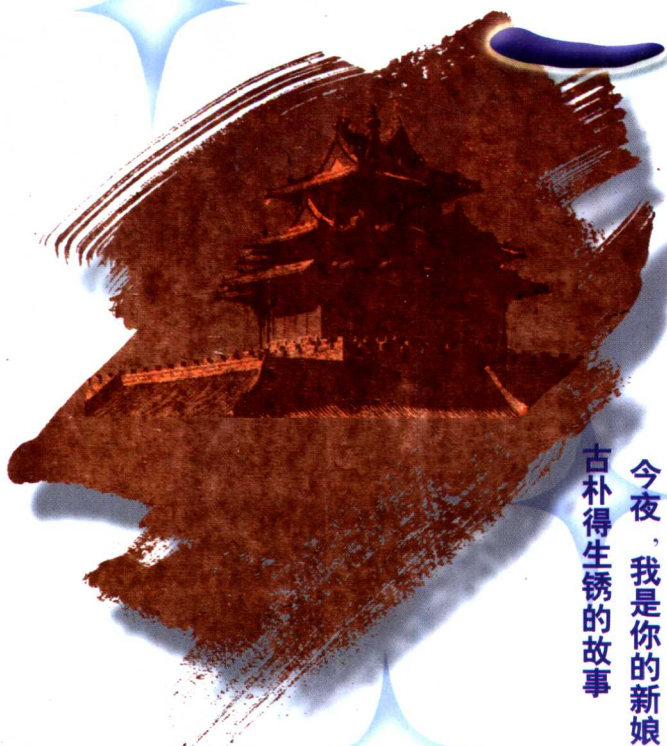
《散文选刊》选编

主编 王剑冰

五十年前的最后

WUSHI NIANQIAN DE ZUIHOU YIYE

一夜



中国人与吃
不敢认同的家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古朴得生锈的故事

广西人民出版社

《散文选刊》精品丛书

生活随感

五十年前的最后

WUSHI NIANQIAN DE ZUIHOU YIYE

一夜

《散文选刊》选编 王剑冰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王剑冰主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9

(《散文选刊》精品丛书·生活随感)

ISBN 7-219-04211-6

I. 五…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6149号

责任编辑 彭庆国 白竹林 戴育云

责任校对 李带舅

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

《散文选刊》选编 王剑冰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12.75印张 320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219-04211-6/I·676

定价:20.00元



序 言

● 王剑冰

《散文选刊》出这套精品丛书已不是一天的想法了。年年都酝酿着，年年都未成事。厚厚的一摞子刊物，不敢轻易下手。这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呀。新世纪的开始，终于给选编这套书找了个下决心的借口，恰又与广西人民出版社一拍即合，便组织人员全力以赴进行了“挖掘”。

这一套精品丛书共分四部，即“黄钟大吕”、“精短美文”、“生活随感”、“青春校园”。“黄钟大吕”应当是写文化、历史、社会的沉实厚重、雄浑激越的“大作”，读之让人警醒、让人感奋，文体上被视为“大散文”的范畴；“精短美文”顾名思义即是精短的“纯散文”，其顽强地具有散文的原本属性，美汁美味，芳醇可人；“生活随感”是以反映人的生命本质及生存方法、生存环境为主的，是具有可读性、可感性、可悟性的濡染心灵的作品；“青春校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青春期的情感体验为内容，另一部分是青年人的校园生活及与社会碰撞所生发的文字。两部分均具有清纯鲜活、多思善辩、生动感人的特性。

《散文选刊》自一九八四年创刊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七年的



历程。而其所经历的阶段，正是新时期文学迅猛发展的阶段，尤其是散文创作。我们知道，作为文学大树的重要枝干，散文多少年间都发展迟缓，不能健康成长。新时期文学爆响之后，散文同小说、诗歌一样，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滋长得枝繁叶茂。一大批散文新人涌现出来，更多的老作家椽笔转向，一篇篇好作品应运而生。《散文选刊》在此时创刊，对散文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不仅集中推荐并培养了一批散文作家，也使读者除了八十年代初创刊的《散文》之外，有了一个窥望全国散文的窗口。可以说，《散文选刊》起到了一个作家与读者相通的桥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和小说的景势渐逝于前，散文却是丰年逢瑞雪，创作与阅读相互促长，散文刊物和报纸副刊你应我和，直达二十一世纪，这种境况让人喜不自禁，《散文选刊》就像扛着个篮子，好果子拾都拾不及。

我们曾经提出，作为一个刊物的选编者，必须能够把握全国散文创作的发展态势，尽可能多地掌握全国现当代的散文作家的创作情势以及不断涌现的散文新秀的创作趋势。同时，应当不断地丰富自己，使之成为散文方面的行家。往前说，当对先秦以来的古典文学有过较为深层的研究；当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有着较为透彻的把握；更对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新景有着较为独到的认识。总之，《散文选刊》的选编者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调整，不断地深究。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胸怀，不仰视名家，不鄙薄新秀，不以个人的好恶定取舍。经营选刊这么多年，着实感到“选”字不易。谢大光先生送言：“‘选家’不只需要眼力，也需要有思想。散文之选最宜散而后文之，尤须着眼四方散落之文。开阔的视野、多变的视点，才能带来斑斓的呈现。不拘一格才能达到自成一格。”杜渐坤先生也言：“强调‘选家’所具有的独到的眼光和胆气，是至关紧要的。”正基于此，才感到办选刊越来越费力。现在，又要从近二百期刊物中选出四部精选本，就更觉



其难。选编前先确定原则：无论名家还是新秀，一律惟文是举；好文章的标准应当是：没有框框、不落俗套、真心实意、真情实感，不粉饰、不张扬、不矫情，突出一个“新”字。“选中之选”必须能在今天乃至以后站得住脚，得毫不遮掩地接受时间的毫不留情的检验。因此，我们感到仍然像办刊物一样，是干着一项责任重大的工程。我们开始进行彻夜长读，不停地讨论，反复地比较，在超过约定字数的情况下，又下狠心删减。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些选题如“黄钟大吕”，会隔过一本甚至多本《散文选刊》而选不上一篇。那些篇章在当时也许还算上品，但从艺术的发展来看，就有了“过时”的感慨。我们感到，有些在文学的发展中举大旗的作家能够不断地更新自己、改变自己，勤奋的创作始终在文坛有一个发言的席位，确实堪称其为“名家”，也有一些“名家”却是步步为营，固守观念，结果是无可奈何地落伍了，这类作家前期红火过，后期“失踪”了。还有一种感觉，文坛内互“捧”的，评论界“拔”高的一类作家作品，现在看起来实为一般，如果捂住名字去读，或可被“忽略”了。倒是一些后起之秀，学识高，见识面广，有思想有见地，一出手便不同凡响，读着选过的篇章，篇篇显奇景，章章见新迹。选编中还看出一个现象，专事散文的作家曾是八十年代散文大军的主力，后来反倒越写越少，渐显势单力薄，有些甚至偃旗息鼓了，即使坚持者也锋芒萎钝，不见当年威勇。倒是由小说、诗歌、理论、知识、新闻界杀出的新军勇往直前，赢得一片叫好声。为何专事散文的作家渐趋落伍，后来居上的这帮人士舍去自己的所爱而转行散文并取得较大的成就，这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当然，在散文发展中也给我们提出了其他一些课题，比如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问题，语文教学中的散文同当前的散文创作的差异，游记散文该如何写，散文创作艺术的问题能否同作家道德本质相提并论等等。



罗曼·罗兰说过：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品，是用它的时代本质铸造成的。散文家是时代中人，无可避免地同生活发生这样那样的碰撞。而散文的随意、多样性，使其成为相对其他文学样式较为快捷的文体，描写真生活、诉说真心话、感悟真性情无不与人们的生活观念自然地贴近，其精短、本真的属性又与快节奏的时代相吻合。顺着新时期散文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随年代而产生的文学现象。新时期初期即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大批反思文学，举旗的多是些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使“知青文学”达到顶峰；九十年代则出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后又出现了七十年代出生的“晚生代”，这类作家崇尚自然、关注生命、彰显个性、思想活跃，一出现便显示出勃勃生气。至新世纪始，甚至一些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也成批地涌现，其中不少是在校的学生。一些中学生作文，都敢让“名家”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散文的发展速度。只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及对散文的热爱与关注才能使其发展和变革。鲁迅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新时期的散文打破了多少年在散文概念及创作上的模式和框框，接合到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主流上来，回归了本真、自然的散文特质。“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郁达夫语）相对滞后的倒是散文批评，纷攘的散文界，没有多少能伴随这种发展做点云拨雾的导航员。有些散文批评家张扬一些散文理论，老旧而又落俗、非但指引不了散文创作，反会误导散文方向。然而，回过头来想想，散文的“引导者”不多也不是坏事情，小说、戏剧乃至诗歌的评论队伍可谓强盛，却也有与此类文体的发展相抵牾。散文界相对倒显得随意自由。虽也有过对“小女人散文”之类的批评，但仍然宽松的环境并未“棒杀”这些作家及作品。



四部精选作品中，我们还选录了一些外国著名作家及海外华人和港澳台作者的散文，又从“百年百篇”优秀散文提名作品中选录了一些名家名篇。这些散文与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相互映衬，构成色彩纷呈的奇妙景观。读者可从中领略到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创作风格，得到更多的启迪。

选编中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十七年来，不少作家勤奋耕耘，硕果累累，脍炙人口的散文一篇接一篇，这些篇章仅出四部如何容纳得下？为了突出精品的特性、凸现散文发展的全面成果、展示阵容齐整的创作队伍，我们只能确定每位作家的作品在一种选集中只选一篇的原则，而不得不对有些名篇忍痛割爱。另有一个遗憾也是一时解决不了的：理性思辨色彩比较浓郁的学人随笔，情感炽烈、华彩纷扬的散文诗作，识见精辟、论说透晰的散文理论，都一时无法被四部选本所囊括，还有待于下一步的挖掘整理。

从我们所选的四部“精选本”可看出我们的观点：倡导反思历史、针砭时弊、关注人类命运、推动社会进步的“海风山景、气势裹挟”的“大散文”；坚持语言、情境双好、精短凝练的美文本色；主张贴近生活、感应社会、反映现实、创作有血有肉的作品；推举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朝气蓬勃的散文新秀。应当说这正是当今的散文潮流。于二〇〇〇年出版这套《散文选刊》的精品丛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一方面是对二十世纪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总结，又为新世纪的散文发展提供参照。倘若读完这四部精选本会感到窥见了新时期以来散文十七年发展的全貌，看到二十世纪末期散文的精华之光，则是我们十分欣慰的。若有明显的遗漏，请读者朋友告诉我们，以便再版时补正。

感谢真诚的合作者广西人民出版社，他们不只是对《散文选刊》的支持，也是对散文事业的支持。参加本套丛书工作的有王剑冰，负责本书的策划、终审并负责“黄钟大吕”的编选；王冀



沙，负责“生活随感”的编选；葛一敏，负责“精短美文”的编选；宋惠贞、江海巧，负责“青春校园”的编选。在此也向为散文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同行们表示谢意。

二〇〇〇年六月六日于郑州



目 录

1	序言	王剑冰
1	八十自省	萧 乾
9	中国人与吃	秦 牧
13	鞋的故事	孙 犁
17	新疆的歌	王 蒙
22	乡情	周同宾
27	自传	贾平凹
35	战地情趣	杨成武
42	静夜功课	张承志
45	古朴得生锈的故事	刘绍棠
50	留级生的心愿	黄宗英
56	岛人笔记	赵丽宏
61	欢喜佛境界	韩小蕙
71	泪的重量	林 希
77	排戏	赵 园
80	在商厦门前等车	周佩红
83	谁入地狱	韩美林
86	佛缘	戴厚英
92	一个家庭的男人和男人眼中的家庭	韩静霆
97	灯下看信	池 莉
100	孤独	张 宇
104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 | | | |
|-----|------------|-----|
| 110 | 猴年说猫 | 阎 纲 |
| 116 | 沈阳唐人街 | 刘 齐 |
| 123 | 远远的少女 | 王剑冰 |
| 127 | 菩提 | 叶公觉 |
| 132 | 给儿子的一封信 | 刘亚洲 |
| 137 | 醉雀 | 丘 峰 |
| 143 | 黑白人生 | 裘山山 |
| 149 | 总是难忘 | 苏 叶 |
| 161 | 歪嘴仔 | 斯 妤 |
| 167 | 无鬼之旅 | 段荃法 |
| 171 | 古井诗魂 | 张永权 |
| 175 | 波波的选择 | 殷慧芬 |
| 178 | 南阳兵 | 何继青 |
| 184 | 苦丁香 | 范若丁 |
| 190 | 本命年 | 韩石山 |
| 195 | 不敢认同的家 | 京 夫 |
| 200 | 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 | 白 桦 |
| 204 | 孔林深处 | 冀 人 |
| 208 | 无常 | 朱以撒 |
| 215 | 河神 | 杨景民 |
| 219 | 拒绝忘记或夜晚渴望 | 曾有情 |
| 223 | 剑川男人 | 黄晓萍 |
| 228 |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 | 叶 梦 |
| 231 | 卖花姑娘 | 邱华栋 |
| 234 | 狼 | 乔忠延 |
| 238 | 驼背父亲和他的兵儿子 | 胡剑波 |
| 242 | 我的父亲 | 刘晓庆 |
| 246 | 我的情感独白 | 潘 虹 |

256	黄宏，我爱你	黄 宏
262	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
270	继父	雨 亮
276	我的三次初恋	于 君
282	最后一朵爱情的玫瑰	余 飞
289	驼背	彭志明
293	货郎	江 子
298	吴起镇的女性	裴积荣
303	“印度”小黑孩	肖桂贤
306	母性的天空	刘振学
313	楼道里的主妇们	刘亚瑜
318	哑妹	张美华
323	送你一枝勿忘我	张 好
328	“外遇”之后	晓 文
335	寿头	陈海龙
340	没有用过的蓝头巾	施圣扬
345	流自谁流向哪里的第一滴血	黑 孩
349	花坟	吴丽嫦
353	女儿高考	吴 然
357	洞箫村曲	沉 浮
362	不流行的是什么	南 翔
366	鞋的泪	林 深
372	洗脚的感觉	乔 叶
375	小赌	赵培光
380	门镜	张 长
385	守灵思绪	王西兰
390	生命不止一次	王业群
394	编辑后记	王冀沙



八十自省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态

● 萧 乾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去干校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六十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做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八十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人入老境，由于生理上的衰微，节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岁以前，我喜欢蹦着走路。六十岁以前，我上楼梯时还经常一步上两个阶蹬。如今，我不但一蹬蹬地上，而且还手不离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这幢楼，过道总是漆黑一团——我就更加抓紧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也代表一种心态：一生跟头栽够了，就怕再栽。因为知道这把年纪经不起了，万一栽了，休想再爬起来。

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一九七八年我曾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如今，这一圈已跑了大半，离终点不会太远了。前年，重庆出版社要我就这十年的写作，编个选集。经过淘汰，竟然还剩下36万字。倘若加上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文联出版公司）那35万字，竟然又写了七八十万字。自己翻了一下：尽管一直铭记那些告诫，我对生活还是发了言，有的未必合口径。然而我居然能安然无恙至今，证明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与五六十年代的还是有所不同。我庆幸自己在掌握分寸之余，还是坚持了言必由衷的原则，没写让自己事后脸红的什么。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



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人之一生，要过许多关，其中之一是子女关。我看到不少人自己廉洁正派，可轮到为子女奔职业，奔这奔那时，就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一九五七年后我们的处境很恶劣，我和洁若还是不遗余力地培育了孩子。尤其那困难的三年（1959—1961），对高级知识分子补贴的营养品我们都轮不上，洁若就把每月配给的有限的一点糖和油都尽量留给孩子吃，我也当然配合。“文革”期间当周围的红色海洋几乎把我们淹没，除了那本小红书什么也不许看时，我仍督促他们画中外历史纪年表和世界地图，启发他们对大小环境的认识。工资降了好几级，仅够糊口了，我们还省吃俭用，为他们买钢琴、买画箱、颜料和画板，带他们去音乐会听贝多芬，去公园写生。

当然，我们也感激他们。当我的右派身份在孩子面前暴露无遗，他们眼看着我挂了黑牌跪在自家院中挨斗时，他们非但没像旁人家的一些子女那样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揭发、唾骂甚至殴打、背弃我们，而且个个都分担了我们的屈辱，骨肉之情始终也没割断过。如今，我高兴他们都是要强的孩子，各自走上人生的征途，没有依赖思想。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十八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因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二十九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



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一九四六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婚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把人生看做一次采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人随遇而安。我认为这是生存本领的基本功。

有人以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做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



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对事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却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一九三五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十五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

